

## 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演变 及其驱动因素 (2018~2024)

赵新雷

**摘 要：**本文探讨了2018年至2024年间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发展与调整，分析了其外交策略在不同政府领导下的演变。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中东地区始终是其外交战略的重点。自2018年以来，虽然经历了马哈蒂尔、慕尤丁、伊斯迈尔和安瓦尔四位不同的领导人更迭，马来西亚依旧保持了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策略。各届政府在中东战略上虽有共识，即强烈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保护巴勒斯坦，但在具体实施上存在差异。马哈蒂尔与安瓦尔致力于塑造强硬的伊斯兰国家形象，而慕尤丁与伊斯迈尔则侧重温和的国家形象，受新冠疫情及国内政治危机影响，对中东事务的关注有所减弱。整体来看，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体现了一种平衡外交，并通过灵活应对地区不确定性来确保活跃参与。同时，伊斯兰因素在马来西亚中东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成为维系与中东国家关系的精神纽带。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变动也对马来西亚的战略部署产生间接影响。未来，马来西亚将继续积极参与中东事务，致力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马来西亚；美国；中东战略；伊斯兰因素

**作者简介：**赵新雷，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2)。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1-0134-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典型的伊斯兰国家之一,马来西亚自建国以来就始终将伊斯兰教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与变量,不仅是因为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政治精英对内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渠道,还在于伊斯兰教是维系马来西亚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精神纽带与支柱。然而,尽管伊斯兰教因素在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的中东地区却较难成为马来西亚外交战略的核心与重点,马来西亚的传统外交重心仍然是着眼于与周边邻国和中国、美国等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互动。尽管如此,马来西亚仍然与以伊斯兰国家为主导的中东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并表现出相应的特殊性。自1957年以来,伴随着马来西亚领导人的更迭与变化,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战略也随之不断地调整与发展,以适应国际国内环境所带来的不同变化。由最初拉赫曼时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再到拉扎克和马哈蒂尔等积极稳健的中东外交战略,直至纳吉布时期重点发展的经济外交模式。但是,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战略却在2018年迎来了全新的变化与发展,伴随着长期主导马来西亚国内政局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下台,马哈蒂尔领导下的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代替国民阵线成为马来西亚新的执政联盟,马哈蒂尔也借此开启了其第二任任期。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喜来登政变”的爆发促使马来西亚领导人在短短三年内不断更迭,政局不稳定也直接影响了马来西亚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发展与安排。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引发了巴以全面冲突并不断外溢,中东局势的不稳定性与安全危机促使马来西亚需要重新思考其中东战略以有效维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现有关涉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战略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以历史视角切入,通过回顾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中东外交政策的演变以探究不同时期具体的外交政策表现,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拉赫曼执政期间(1957~1969年),马来西亚的中东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的忽视到重视的转变。第二阶段为拉扎克与敦侯赛因执政时期(1970~1981年),这一时段中东战略转变为积极友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拉扎克采取了多元自主的外交手段。第三阶段为马哈蒂尔与巴达维执政时期的中东政策(1981~2009年),马哈蒂尔上台后采取全方位的中东政策,从最初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合作拓展为和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合作,而巴达维以一种积极稳健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外交影

响力<sup>①</sup>。第四阶段为纳吉布执政时期(2009~2018年),弱化相关政治主张与伊斯兰因素,着重突出和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sup>②</sup>。另一方面研究聚焦于马来西亚中东政策的形成机制。微观层次注重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入手,旨在探究身份认同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sup>③</sup>。在分析纳吉布时期的中东政策,相关研究强调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国家身份的塑造,马来西亚进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战略导向,包括:积极的伊斯兰国家、温和伊斯兰国家与逊尼派伊斯兰国家<sup>④</sup>。而宏观层次上,学者提出了马来西亚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内部领导人的认知水平也影响了其中东政策的制定<sup>⑤</sup>。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研究表明了中东地区是马来西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的研究不足。第一,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纳吉布之前马来西亚中东政策的演变与发展,缺乏对 2018 年以来马来西亚中东战略调整的最新分析与讨论。第二,既有研究更多是从相对宏观层次来解读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形成机制,缺少从理论层次上对马来西亚中东战略连续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在这种内外局势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需要进行有效的转型和调整以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重新塑造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形象并巩固与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联系与团结。基于此种情况,本文的研究问题即自 2018 年以来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战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笔者将结合在马来西亚实地调研与访谈的第一手数据与档案资料<sup>⑥</sup>,深入剖析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战略的发展与

① 朱陆民、阳海飞:《纳吉布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政策评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96-119 页; Nossal Kim Richard and Stubbs Richard, eds., *Mahathir's Malaysia: An Emerging Middle Power,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147-163.

② Hamid Ahmad Fauzi Abdul and Razali Che Hamdan Che Mohd,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Islam in Malaysia in the Era of Najib Razak, 2009-2013,"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15, pp. 301-337; 朱陆民、阳海飞:《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政策评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49-58 页。

③ Waikar Prashant, Osman Mohamed Nawab Mohamed and Ali Rashaad, "Dancing with the Ummah: Islam in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under Najib Razak,"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2, 2021, pp. 230-258.

④ Burton Guy, "Middle Power Behavior Under Multipolarity: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Arab uprisings,"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3, No. 2, 2021, pp. 228-247.

⑤ 范若兰:《当代东南亚与中东关系发展》,载《东南亚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25-28 页。

⑥ 笔者于 2024 年 7 月在马来西亚当地开展田野调查,先后拜访了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CA)、马来亚大学(UM)、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与马来西亚外交部下属外交与对外关系研究所(IDFR)等多个学术机构与政党单位,并对多个马国学者与政党精英开展了访谈。笔者感谢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伊克巴尔(Dr. Mohd Ikbali)为本文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变化,并为分析与理解其中东战略的形成提供更为客观与学理性的分析。

## 二、理论框架：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形成机制

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因为对外战略不仅直接影响着本国与外国关系的发展,还在于本国是否能够凭借切实可行的战略以获得相关利益<sup>①</sup>。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中东国家似乎较少会成为它们外交战略的重点目标,由于地理距离相对较远,导致以中小国为主的东南亚国家较难将有限的外交资源投射到中东地区<sup>②</sup>。然而,中东地区与东南亚地区无法割舍的宗教联系,特别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宗教因素是影响马来西亚制定其中东战略的重要变量,也是促进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sup>③</sup>。尽管宗教因素在马来西亚的外交战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其中东战略的最终形成仍然有其他内外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内部的伊斯兰因素与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的领导人认知、精英合法化路径与经济、人口等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部环境往往塑造着国家对外战略的具体方向与路径,而在马来西亚的外交战略中,第一要素则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主要指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环境中各国的行为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存在极大的战略模糊性,让国家难以在此种情景下采取直接的战略选择<sup>④</sup>。特别是当国际关系中大国竞争所诱发的不确定性,更是会让其他国家难以做出有效的预测与判断,由于国家本身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的动态变化中会采取有效的方式以维护自身利益与安全<sup>⑤</sup>。然而,大国竞争并不是发生在所有地区的,有的地区则是表现为内部多个国家之间的互相竞争与冲突,这种地区特点也表明了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国际体系。因此,在多个国家竞争的地区秩序中,多极体

---

① Hudson Valerie, Day Benjamin S,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 2019, p. 35.

② Putnam Robert D, eds., *Two-level Games: The Impact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Transatlantic Bargaining America and Europe in an Era of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69-83.

③ Milner Anthony, "Long-term Themes in Malaysian Foreign Policy: Hierarchy Diplomacy, Non-interference and Moral Balance,"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4, No. 1, 2020, pp. 117-135.

④ Kaplow Jeffrey M, Gartzke Erik, "The Determinants of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5, No. 2, 2021, pp. 306-319.

⑤ Rathbun Brian C,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3, 2007, pp. 533-557.

系比两极或单极体系更加混乱,这种不确定性表现的则更加突出,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也更难以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保持距离和风险规避则成为国家的最优选择<sup>①</sup>。

除了不确定性以外,伊斯兰因素则是体系层次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传统观点认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实力较小的国家,与大国间实力不对称让小国陷入了两难之间的抉择困境。因为无论如何选择,实力较小的弱国可能会引发来自其他大国的恶意与敌对,尤其是一旦站边失败,弱国将无法承受对外战略选择失败的沉重代价与后果,小国此时是相对被动的<sup>②</sup>。然而,当小国与地区内的国家相对实力较为接近或处于同等水平时,此时小国具有了更多的战略主动性与积极性,而小国的国家定义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从小国逐渐转变为中等强国。伊斯兰因素是马来西亚沟通和维系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重要纽带与支柱,而伊斯兰因素也塑造着马来西亚的国家身份认同。尽管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伊斯兰内部衍生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不同国家与民族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却具有许多共性,特别是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上<sup>③</sup>。这种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会加强不同伊斯兰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团结,特别是当伊斯兰国家受到外来冲击时,伊斯兰核心价值会高度引导各国团结一致,以统一抵御外来风险与压力。在这一价值观的渲染下,马来西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外交战略同伊斯兰因素相结合,不仅将中东伊斯兰国家作为外交发展的重点对象,还将其视为伊斯兰宗教观念下的好兄弟与伙伴。因此,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战略与伊斯兰因素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东国家也自然在马来西亚外交蓝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体系层次上的影响变量外,国内政治也对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领导人的认知。国际关系中领导人的认知水平往往在国家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性格也会起到辅助性的影响。因为领导人作为政治体制内部的最高决策者,拥有对外决策的最终决策权,领导人会根据自身对周边环境的直接感受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变化。这也与领导人自身的威胁认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威胁认知作为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概念,

---

① Kuik Cheng Chwee,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21, pp. 500–514.

② Kuik Cheng Chwee, “Getting Hedging Right: A Small-state Perspec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3, No. 2, 2021, pp. 300–315.

③ 薛庆国:《阿拉伯伊斯兰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当代审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3–16 页。

它主要强调国家对外部的主动行动与被动感受,主动行动体现在国家为实现本国目标而实施的各种行为,被动感受表现在他国对本国可能采取的某些制裁等威胁自身安全的活动<sup>①</sup>。

第二,国内政治精英合法化路径。尽管领导人在宏观层次上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出总领性的意见指导,但政治精英也是国家内部外交政策重要的决策者与参与者,特别是政治精英不同的合法化路径决定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政治精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充分增强自身在本国的执政基础,而合法化路径往往包括四种方式,包括绩效合法化、特殊性合法化、价值观合法化与程序合法化等。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绩效合法化与特殊性合法化是其国内政治精英主要的合法化路径。绩效合法化主要指政治精英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的直接经济收入为主,在对外政策上寻求与他国开展多维度的经济合作与互动,通过直接提高民众收入来转化对政府的持续支持与信任,进而夯实自身的执政基础<sup>②</sup>。绩效合法化的特点在于国内政府更加将对外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的焦点与核心,一些国家尽管与其他国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摩擦与矛盾,但是仍然会选择搁置政治矛盾转向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相较于绩效合法化,特殊性合法化体现在政治精英寻求维护占国内主导种族的核心利益与地位,因为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许多的本土族群,它们占据了其国内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维护本土族群的核心利益有助于保证合法性的稳定来源与获得,但这种合法化路径的弊端则是以牺牲其他少数族裔的既得利益来换取主体民族的绝对支持与信任,这也导致国家的政策实施均衡性和平等性严重不足,在经济、政治与教育等多方面都向主体民族倾斜,少数族裔只能从国家得到少数或有限的资源分配<sup>③</sup>。对于国内政治精英来说,尽管会伤害少数族群的利益,但是却获得了最广泛本土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对于其巩固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国内政治精英的不同合法化路径的选择决定着国家对外战略的具体表现与强度。

第三,经济、人口等物质因素。中东地区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扮演着至关

<sup>①</sup> Baldwin David A, "Thinking About Threa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5, No. 1, 1971, pp. 71-78.

<sup>②</sup> 查雯、吕蕙伊:《价值观、程序、还是绩效? 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小国家对华经济依赖与外交政策跟从》,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第87-114页。

<sup>③</sup> Kuik Cheng Chwee,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4, 2013, pp. 429-467.

重要的角色与地位,不仅是因为中东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得许多国家都必须采取一定的外交政策以塑造与中东国家的稳定关系,还在于中东地区身处欧亚大陆与非洲等交通要道,是世界交通的枢纽,也是许多国家能源进口的重要通道,因此稳定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助于保证国家的能源进口安全。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性与重要性,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其中东战略的安排与实施,而与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经贸关系的国家更会成为其中东战略实施的优先对象与目标。人口因素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有些中东国家虽然经济上对马来西亚的影响程度较低,但是国内有着大量的穆斯林人口数量,马来西亚不得不重视对这类国家关系的发展,例如伊朗。虽然伊朗在马来西亚的中东经济布局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是伊朗是整个中东地区的第二大人口大国,国内人口将近九千万。尤其是伊朗在以色列问题上与马来西亚保持着高度一致的观点与立场,都强烈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巴以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合作基础与共识<sup>①</sup>。因此,经济与人口等物质因素也是促进马来西亚中东战略发展的又一大重要因素。

可以说,马来西亚中东战略本质上遵循一种典型的平衡外交策略,旨在通过与多个大国和地区力量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以避免过度依赖或受制于某一个大国,从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性和战略利益。这种外交策略强调多边关系,灵活性与适应性,利益多元化,独立自主,战略模糊和安全保障。平衡外交强调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通过多边关系寻求支持和合作,避免单一依赖导致的脆弱性。同时,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便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战略,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和机会。追求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平衡,通过多元化的合作关系,最大化自身利益,减少对单一领域或国家的依赖。因此,本文的平衡外交具体包括直接追随、有限制衡、多元互动与经济实用主义等多种手段,目的在于促进与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友好互动与合作,积极培育外部资源,拓展战略的活动空间。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发展既受着外部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又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面对着中东地区复杂的地区形势时,马来西亚需要充分利用平衡外交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

基于上述理论解释,下面将以 2018~2024 年为研究时间线,探究后纳吉布时代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变化与发展。

---

<sup>①</sup> Togoo Rizwan Rafi, "Malaysia as the Principal Column of Iran's 'Look-East Policy,'" *Journal For Iranian Studies*, Vol. 5, No. 13, 2021, p121.

### 三、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发展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举行了第十四次全国大选,而选举结果则让人出乎意料,纳吉布不敌前总理马哈蒂尔,长期垄断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国民阵线也结束了其长达61年的执政党地位,而马哈蒂尔领导下的希望联盟成为新的执政联盟,也实现了马来西亚政府自独立以来首次的政党轮替。伴随着国内领导人与政党的更迭,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也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发展的根源则是马哈蒂尔的重新上台,不仅标志着马来西亚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还象征着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战略的更新和实施。

#### (一) 马哈蒂尔执政时期的中东战略再出发(2018~2020年)

马哈蒂尔是一位改变了马来西亚国家发展轨迹的领导人。自1981年上台后,马哈蒂尔采取了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倡导“向东看”政策和“亚洲价值观”,积极推动同东亚国家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和白人主义至上的观念,为促进整个东亚国家的团结协助作出了巨大贡献<sup>①</sup>。在中东政策上,马哈蒂尔着力将伊斯兰因素作为对内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首要来源,积极维护马来土著人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外将伊斯兰因素视为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精神纽带,积极参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各种地区事务中,将中东伊斯兰国家视为马来西亚的兄弟与伙伴,以强硬的举措抨击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各种压制行为<sup>②</sup>。在马哈蒂尔内外政策的并举下,马来西亚与中东地区塑造了友好合作的基础,但随着马哈蒂尔在2003年下台,后上任的巴达维与纳吉布逐渐改变了马哈蒂尔的中东战略模式,由强硬的伊斯兰国家形象转变为温和的伊斯兰形象。

随着2018年马哈蒂尔的再度上台,其中东战略将如何实施再度成为外界所关注的焦点。相较于前任纳吉布的温和保守的中东政策,马哈蒂尔第二任任期内的中东战略出现了部分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限制衡与多元互动策略。相比于马哈蒂尔第一任任期,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中东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与恶劣,表现在美国战略转移、美俄大国的利益冲突、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巴以冲突的持续恶化

<sup>①</sup> 郑勋、郭秋梅:《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69-91页。

<sup>②</sup> 朱陆民、阳海飞:《纳吉布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政策评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4期,第96-119页。

与加剧。这种复杂局势下极其考验着马哈蒂尔的执政能力与策略实施。马哈蒂尔采取了更为强硬直接的中东战略,抨击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对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制裁与打击,着力捍卫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团结与互帮互助<sup>①</sup>。特别是当纳吉布执政时期降低了中东地区在马来西亚外交顺序的地位时,马哈蒂尔重新提高了中东地区在马来西亚的外交秩序的优先性,即东盟国家第一位、中美等其他大国第二位和中东国家第三位。

尽管中东国家在马哈蒂尔第二任任期内并不是第二顺位的外交伙伴,但并不影响马哈蒂尔对中东地区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尤其是此时期内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对中东国家采取制裁和打击的手段,马美关系的相对恶化与摩擦等双重影响,更进一步强化了马来西亚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友好合作的趋势。例如 2017 年特朗普先后发布了三次“禁穆令”,无限期禁止相关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进入美国<sup>②</sup>。此禁令一出瞬间引发了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包括马来西亚在内,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国家的特别歧视。马哈蒂尔表示:“如果特朗普禁止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为什么我不可以阻止以色列人进入马来西亚”<sup>③</sup>。随后,为了表达对美国穆斯林禁令的强烈抗议,马哈蒂尔拒绝向以色列来马参加残奥会游泳锦标赛的运动员发放签证<sup>④</sup>。2020 年 1 月 8 日,美国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进一步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以及整个中东局势的混乱与恶化,马哈蒂尔为此批评美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不道德,可能会导致所谓恐怖主义活动升级,甚至表达“伊斯兰国家是时候团结起来了,我们现在不再安全,如果任何人发出侮辱或者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另一个国家的人可以派出无人机报复,甚至击杀我

---

① Rogers Roy Anthony, Altala Nour and Amin Wan Sharina Ramlah Wan Ahmad, “The Mahathir Influence and the Changing Phases of Malaysia-Syria Diplomatic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 2019, pp. 35-54.

② “A Licence to Discriminate: Trump’s Muslim & Refugee Ban,” *Amnesty*, October 6, 2020, <https://www.amnesty.org.uk/licence-discriminate-trumps-muslim-refugee-ban>,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Islamophobia in the U. S. Did Not Start with Trump, but His Tweets Perpetuate a Long History of Equating Muslims with Terrorism,” USC Dornsife, January 29, 2020, <https://dornsife.usc.edu/news/stories/president-trump-perpetuate-long-history-of-islamophobia-in-usa/>,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

③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的,你是男人》,半岛电视台,2019 年 1 月 30 日,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19/1/30/mahathir-mohammed-yes-you-are-a-man>,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

④ 同上。

(perhaps shot at me)”<sup>①</sup>。可以说,特朗普任期内的穆斯林恐惧症加深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裂痕,也让马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得岌岌可危,而马哈蒂尔继续发展了其中东战略,既强硬批评美国与以色列等反伊斯兰国家的种种行为与活动,又继续保持与发展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合作。

为了加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合作,2019年12月19日,在马哈蒂尔的呼吁下,吉隆坡伊斯兰峰会顺利召开,峰会目的是重点探讨伊斯兰世界遭遇这些问题的背后动因,并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寻求解决方法<sup>②</sup>。此外,2020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新的中东和平计划,即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允许以色列完全控制定居点,并承认耶路撒冷归以色列,还包括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马哈蒂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与反对:“大马政府无法接受这种不公正的计划,巴勒斯坦人被排挤掉……中东和平计划只会导致中东地区发生更多冲突,并激怒全球数十亿人。”马哈蒂尔在第三届圣城(AI-Quds)议员联盟大会接受采访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辞职<sup>③</sup>。为此,马哈蒂尔成立跨政党国会核心小组和大马—巴勒斯坦友谊组织,以便更能了解巴勒斯坦在巴以课题所面对的问题,并做出努力。以上种种行动可以看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处置不当和对中东其他国家的无理行动,强化了马哈蒂尔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团结与共识。在反对美国对穆斯林问题上,马来西亚与中东国家有着共同的外部需要。尽管马哈蒂尔在其上任后在中东事务上表达了强硬立场,但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有限制衡。尽管中东地区是马来西亚外交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到马来西亚在安全与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度的外交批评可能会影响到美马关系的未来发展与稳定,这对追求多元化外交发展的马来西亚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重塑经济实用主义。在马哈蒂尔第一任任期时,其经济外交的重点放在拓展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经济关系与合作,尤其加强双边在棕榈油、石油等重要产业的经济合作,同时以伊斯兰金融为重点方向,着力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打造

<sup>①</sup> 《马哈蒂尔批美暗杀苏莱曼尼:这样我也可能被炸死》,凤凰网,2020年1月7日,<https://news.ifeng.com/c/7t3DBIfqv1q>,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

<sup>②</sup> 《马来西亚召开吉隆坡伊斯兰峰会》,半岛电视台,2020年12月19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19/12/19/kuala-lumpur-islamic-summit-kicks-off>,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穆斯林世界“处于危机状态”》,半岛电视台,2019年12月19日,<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2/19/mahathir-mohamad-muslim-world-in-a-state-of-crisis>,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

<sup>③</sup> 《中东和平计划漠视巴国人权 敦马促特朗普辞职》,载《星洲日报》,2020年8月2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00208/international/3020520>,上网时间:2024年7月20日。

一套服务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金融体系与系统。马哈蒂尔第二任任期开始后,马来西亚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变化来源于前任领导人纳吉布任期内阿联酋与沙特的腐败问题,造成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约 45 亿美元的损失,而阿联酋与沙特分别是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这种贪污也间接影响了马来西亚与这两国的经济关系,促使马哈蒂尔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东的经济战略<sup>①</sup>。对于马哈蒂尔来说,前任纳吉布所涉及的贪腐问题是其必须加以重视与解决的,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还涉嫌干涉马来西亚国家内政,所以马来西亚无法容忍沙特与阿联酋相关举措,经济战略必须在保证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实施<sup>②</sup>。因此,马哈蒂尔积极重新建立新的经济合作基础,反对贪污腐败,拒绝外部国家干涉内政,寄希望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经济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内政权的更迭,马哈蒂尔领导下的希望联盟对中东地区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与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原因则来自马来西亚外部与内部政治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区域内的不确定性。尽管伊斯兰因素是保证和促使马来西亚实施中东战略的第一要素与准则,无论马来西亚领导人出现怎样的更迭,中东伊斯兰国家都将是马来西亚外交战略的重点目标与方向,马来西亚也需要通过巩固与团结中东国家以塑造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形象。所以,伊斯兰因素决定了马来西亚对中东地区的前进外交<sup>③</sup>。然而,存在的问题是马哈蒂尔任期内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与动荡,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冲突与外部大国在本地区的争权夺利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尽管美国同马来西亚外交关系处在紧张状态,但基于两国在反恐与安全上的需要,马哈蒂尔不能完全恶化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因此马哈蒂尔领导下的马来西亚需要审慎思考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程度,避免因过度参与而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利益<sup>④</sup>。特别是作为一个实力相

---

① 《马来西亚 阿联酋和沙特的新失败》,半岛电视台,2018 年 5 月 14 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18/5/14/malaysia-new-failures-in-the-united-arab-emirates-and-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② Mahathir's Reforms Could Put Saudi Arabia and UAE on the Spot, *The Daily Star*, June 2, 2018, <https://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global-affairs/mahathirs-reforms-could-put-saudi-arabia-and-uae-the-spot-1584985>,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③ Kuik Cheng Chwee and Lai Yew Meng, "Deference and Defiance in Malaysia's China Policy: Determinants of a Dualist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 No. 2, 2023, pp. 1-20.

④ 华黎明:《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几点看法》,载《外交》(季刊)2015 年总第 118 期,<https://www.cpifa.org/cms/book/8>,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对较弱的国家,虽然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之为中等强国,但是在有限的外交资源下,马来西亚的优先外交目标仍然是东盟国家和中美等大国,所以以相对较少的外交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才是最明智的。因为对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既是避免在俄美大国之间的选边站队,又是一种对当下局势不确定的一种风险抵消策略,尤其是通过有限制衡、直接追随与经济实用主义等多种战略工具的使用,马来西亚可以有效参与到中东地区的各种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又保证了中东战略的广泛活动空间与自主权。这也解释了为何马哈蒂尔一方面对美国作出强烈的批评与指责,另一方面又积极同广泛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本质上是马来西亚小国多种战略工具交替使用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是领导人认知与政治精英合法化路径。外部不确定性与伊斯兰因素共同决定了马来西亚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方向。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时任领导人马哈蒂尔的认知影响。相较于马来西亚其他领导人,马哈蒂尔有两个重要特质影响了他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其一是在国际上敢怒敢言,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的性格。马哈蒂尔强烈反对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亚洲国家应当追求并建立属于亚洲的集体价值观<sup>①</sup>。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多次作出反穆斯林行动时,马哈蒂尔都给予了强烈的回应与抨击,所以马哈蒂尔塑造了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国家形象寄希望引导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合作,共同面对外来的威胁。其二是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治世哲学。马哈蒂尔提倡一种实践性的伊斯兰观点,反对繁文缛节的伊斯兰教条与仪式,认为伊斯兰是一种生活方式,应当有机地融入现实生活之中,伊斯兰国家应当注重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致力于寻求在经济、科技与军事上的独立自主<sup>②</sup>。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也让他采取了亲伊斯兰国家的中东政策,将中东伊斯兰国家视为兄弟和友好伙伴,这也让其赢得了来自广泛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好感与支持。因此,马哈蒂尔的性格特质影响了他作为领导人对国际复杂局势的判断与分析,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必须在这种危急时刻作出必要的行动以捍卫自身伊斯兰领导者的光辉形象,所以多元外交路线成为马哈蒂尔第二个执政时期的主要选择,表现在直接追随于其他伊斯兰国家,有限制衡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各种行动,多元化发展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合作与互动。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则是国内政治精英的不同合法化路径。

<sup>①</sup> 陈中和:《“90后”的政治套路:马哈蒂尔与伊斯兰实用主义》,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https://www.sohu.com/a/249877923\\_232950](https://www.sohu.com/a/249877923_232950),上网时间:2024年7月20日。

<sup>②</sup> 同上。

对于马来西亚这样的多种族国家来说,如何保证各种族之间的利益分配相对均衡是一个考验政府和政党的重要难题,对于马哈蒂尔和其领导下希望联盟的政治精英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思考路径。特殊性合法化是促成中东战略发展的主要路径<sup>①</sup>,这来源于马来西亚伊斯兰身份的双重性。

一是本土马来人是马来西亚国内的主导民族,而马来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这也促使伊斯兰因素是政治精英赢得国内马来族充分支持与信任的执政基础与合法性的首要来源。马哈蒂尔作为一个马来族的政治精英,也深知团结广大的马来族对于巩固自己和希望联盟的执政基础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他上台后在对内政策上充分考量了马来族的利益诉求,积极突出马来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优先地位。然而马来西亚国内华人与马来人对此却未保持高度一致的看法,在笔者对部分华人采访中,他们表示当时马来西亚国内正处于新冠疫情与行动管制令时期,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对巴以冲突不感兴趣,认为这不过是茶杯里的话题<sup>②</sup>。时任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戴子豪也呼吁华人应当理解马来人的情感需求,在国家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因此,尽管华人与马来人并没有保持完全的看法相同,但基于绝对主导的马来人是马哈蒂尔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来源,马哈蒂尔因此高度重视。

二是伊斯兰因素是塑造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份的重要基础,也是沟通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重要基石。本土马来族民众深刻地意识到中东国家是与其相同的穆斯林身份,尽管种族与国家不同,但伊斯兰教的教义却让双方产生了天然的亲切感,当中东穆斯林民众遭受美国等非法的打击时进而引发了马来族民众对其关注与同情,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或政党必须作出发声<sup>③</sup>。基于这样的情况,马来西亚政治精英需要照顾到民众的声音,不仅对提高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还在于能够加强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合作。因此,在马哈蒂尔第二次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平衡外交策略,即对外塑造强硬的伊斯兰国家形象,大力批评与反对美国对中东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打击,同时采取积极进取的经济实用手段发展同中东国家广泛的经济关系,促进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双重获得。

---

① 齐顺利、翟晓华:《马来西亚巫统政府时期国际移民与民族国家建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第109-116页。

② 《与我无关之“以巴冲突”》,载《星洲日报》2021年5月25日。

③ 林绮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历史剖析》,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第68-78页。

表 1 马来西亚与中东主要国家 2023 年贸易情况 (单位: 美元)

国家	进口数据	出口数据	贸易总额
阿联酋	55.7 亿	31.2 亿	86.9 亿
沙特	95.7 亿	15 亿	110.7 亿
伊朗	0.47 亿	4.1 亿	4.57 亿
卡塔尔	6.03 亿	3.1 亿	9.13 亿
伊拉克	0.98 亿	4.2 亿	5.18 亿
土耳其	4.8 亿	38.4 亿	43.2 亿
阿曼	8 亿	3.1 亿	11.1 亿

资料来源: 根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资料整理,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上网时间: 2024 年 7 月 21 日。

## (二) 后“马哈蒂尔”时期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发展(2020~2022 年)

2020 年 2 月 21 日, 马来西亚国内政局迎来了自独立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 从 2020 年至 2022 年, 在短短三年内, 中央政府先后经历了三次的更迭, 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因故辞职, 由新组建的国民联盟及慕尤丁担任新总理。

慕尤丁执政后, 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再度迎来了新的变化与转折。慕尤丁的中东战略安排以柔化著称, 特别是着力于重新塑造一个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形象, 不再强调在中东穆斯林事务的强硬碰撞。这种战略安排也体现在慕尤丁与美国关系的处理上, 慕尤丁不同于马哈蒂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进行大肆批评与抗议, 而是采取低调与安静外交, 寄希望于重新获得美国的好感与支持, 重铸美马之间的广泛合作<sup>①</sup>。2020 年拜登赢得大选后, 慕尤丁第一时间祝贺拜登, 并传达了希望进一步促进马美关系更上一层楼和更好合作<sup>②</sup>。

慕尤丁还采取了政治外交与宗教外交并行的中东战略, 延续了马哈蒂尔的亲穆斯林政策, 一方面慕尤丁积极巩固同阿联酋和沙特的稳定外交关系。在马哈蒂尔任期内, 马来西亚同沙特与阿联酋的关系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与摩擦, 导致马来西亚在中东的形象遭到了少许的不利影响。慕尤丁为了继续捍卫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的积极外交形象, 向沙特与阿联酋传达了友好与积极的互动信号, 以

<sup>①</sup> 赵新雷:《马来西亚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整(2018—2022 年)》, 载《东南亚纵横》2022 年第 6 期, 第 79—89 页。

<sup>②</sup> 《慕尤丁恭贺拜登胜出, 冀马美关系会更好》, 当今大马, 2020 年 11 月 8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49959>, 上网时间: 2024 年 7 月 21 日。

重新获取沙特与阿联酋的信任与好感,促进新的发展<sup>①</sup>。为此,慕尤丁任命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来加强两国关系的合作,并且还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举措,任命伊斯兰党(PAS)主席哈迪阿旺为中东特使,以表达其对中东地区的高度关注与重视<sup>②</sup>。2020年3月6日,慕尤丁访问沙特与阿联酋,以拉近两国的友好关系与合作。特别是慕尤丁高度重视利用伊斯兰因素来夯实同阿联酋和沙特等中东国家之间的政治基础,以打消此前两国对马来西亚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慕尤丁还采取了经济实用主义的手段,沙特与阿联酋在整个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版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这两国关系的好坏是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获得关键利益的重要保证,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对于马来西亚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更强化了慕尤丁的经济关注。慕尤丁对两国的访问重点之一在于贸易投资、农业、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最终在慕尤丁多元外交的政策下,马来西亚与沙特先后签署了三项协议,即建立沙特—马来西亚协调委员会,有关朝觐事务的协议和有关伊斯兰事务的谅解备忘录。访问期间,沙特政府还批准了马来西亚额外1万名朝觐配额的请求<sup>③</sup>。

然而,尽管慕尤丁延续了马来西亚传统的中东战略重心,但是其战略部署仍然是受到了内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尤其是来源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慕尤丁本人具有浓厚和强烈的伊斯兰观念,倡导温和、宗教宽容和尊重他人等伊斯兰价值观,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他作为领导人的认知发展,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视为马来西亚自身的兄弟姐妹,与其建立友好关系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责任的。就如慕尤丁本人所说:“中东和平是可能的,因为该地区的冲突不是不可调和的文化或宗教冲突,而是一种人为现象,植根于土地、机会和正义问题。并且,这是一场在一生中蔓延得非常严重的冲突,我们将共同努力遏制破坏性因素,并认识到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情他们兄弟姐妹的痛苦”<sup>④</sup>。当以色列

---

① “Pandemic Not a Barrier to Muhyiddin’s Commitment to Strengthen Foreign Ties,” *The Sun*, November 8, 2020, [https://thesun.my/local\\_news/pandemic-not-a-barrier-to-muhyiddin-s-commitment-to-strengthen-foreign-ties-NE6969924](https://thesun.my/local_news/pandemic-not-a-barrier-to-muhyiddin-s-commitment-to-strengthen-foreign-ties-NE6969924),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② “Muhyiddin’s Special Envoy to the Middle East: Largely Ceremonial,” *Fulcrum*, May 11, 2021, <https://fulcrum.sg/muhyiddins-special-envoy-to-the-middle-east-largely-ceremonial/>,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③ “Muhyiddin’s Visit to Boost Malaysia-Saudi Ties on All Fronts, Say Saudi Minister,” *Mida*, March 11, 2021, <https://www.mida.gov.my/mida-news/muhyiddins-visit-to-boost-malaysia-saudi-ties-on-all-fronts-say-saudi-ministers/>,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④ “A Peaceful Middle East Possible, Says Muhyiddin,” *Theedgemalaysia*, September 11, 2013, <https://theedgemalaysia.com/article/peaceful-middle-east-possible-says-muhyiddin>,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列袭击加沙地带时,引发了慕尤丁的高度关注与不满情绪,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与利益。尽管慕尤丁的个人认知吸引了他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高度关注,但这却与自身的合法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慕尤丁执政期间最严重的危机来源于其缺乏稳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当反对党发起对他的不信任投票时,他始终以“行动管制令”作为捍卫自己政治权威的手段与方式,延缓国会的召开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举措引发了国内政治精英的强烈不满与抗议<sup>①</sup>。特别是慕尤丁国民联盟的执政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内部有多个政党的利益冲突,包括土著团结党、巫统、伊斯兰党与沙捞越政党<sup>②</sup>。而在获取合法性的路径上,慕尤丁寄希望于通过控制疫情的蔓延与经济的复苏以赢得马来西亚民众的支持与信任,但由于他在疫情与经济复苏等国内最主要的问题上表现十分不力,控制新冠疫情和重振经济乏力,无法通过绩效方式以转化相应的合法性基础<sup>③</sup>。因此,慕尤丁遭遇的政治困境成为其中东战略收缩的核心原因,减少对中东地区外交资源的投入,聚焦国内经济发展,进而经济实用主义与多元互动成为具体的政策组合。慕尤丁的战略安排导致其中东战略实施的范围与影响十分有限。

伊斯迈尔·沙必里领导的国民阵线的重新执政后,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出现了新的发展。一方面伊斯迈尔政府采取经济实用主义为主,政治外交为辅的战略路线。伊斯迈尔上台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遏制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并重振经济的迅速复苏,新冠疫情让该国经济发展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对内消费不足,对外缺乏动力<sup>④</sup>。而中东地区是马来西亚经济战略的重要伙伴与目标,伊斯迈尔也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扭转国内当下的经济颓势,带领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才是根本之策。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伊斯迈尔的执政稳定,减少国内党派之间的争斗,还可以促进广大民众的经济增长并充分赢得选民

① “The Rise and Fall of Malaysia’s Muhyiddin Yassin,” *Reuters*, August 1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BN2FH0QH/>,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② 《诸多内忧外患仍待解决,论者直言国盟政府脆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2020年3月3日,<https://klscah.org.my/2020/03/19390.html>, 上网时间:2024年12月19日。

③ 《慕尤丁首相面临的后疫情困境》,当今大马,2020年8月22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21932>,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④ “Malaysia’s New Prime Minister Brings Graft-tainted Party Back to Power,” *Reuters*, August 2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malysias-king-expected-name-new-pm-after-rulers-meet-2021-08-20/>,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的支持与信任,从而增强国民阵线的执政合法性基础<sup>①</sup>。所以,实用主义才是当下制定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即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为核心,搁置与他国的分歧和矛盾,将与他国的经济合作置于国家外交路线的第一位。

在此观念影响下,伊斯迈尔先后访问了卡塔尔、阿联酋与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并与这些国家先后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以增强与这些国家在金融、旅游、石油与食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例如 2022 年 3 月 25 日,伊斯迈尔与高级部长兼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穆罕默德·阿兹明·阿里一同访问卡塔尔与阿联酋,而此次访问不仅为马来西亚带来了 41 亿令吉的经济投资,还与其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议案<sup>②</sup>。在阿联酋,马来西亚公司与其商业伙伴签署和交换了九份备忘录,其中包括五份谅解备忘录,两份业务探索备忘录,一份协议备忘录和一份意向书<sup>③</sup>。2022 年 7 月 4 日,伊斯迈尔应邀请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是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沙特和阿联酋,两国在本次访问中签署了十五份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特别是马来西亚加强了与土耳其就棕榈油的合作<sup>④</sup>。据统计,2021 年马来西亚向土耳其出口了价值 10.6 亿美元(46.7 亿令吉)的棕榈油及棕榈油产品,棕榈油也成为沟通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战略性物资。伊斯迈尔中东战略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着眼于政治的切入,而是将政治互动有机地与经济策略融合在一起,在促进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拉近对方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好感与信任,进而夯实彼此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采取了多元并举的价值观外交。伊斯迈尔的治国理念与前任马哈蒂尔存在相似之处,两人都尊重并突出伊斯兰因素在本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中东战略都以亲伊斯兰国家为具体表现,特别是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伊斯迈尔旗帜鲜明地要求美国进行干预,以阻止其盟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

---

① “Malaysia PM to Sign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Opposition,” *Al Jazeera*,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9/13/malaysia-pm-to-sign-cooperation-agreement-with-opposition>,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1 日。

②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s Maiden Visit to Qatar and UAE Bought in RM4.1 Billions of Investments via Agreements,” *Mida*, March 25, 2022, <https://www.mida.gov.my/prime-minister-of-malysias-maiden-visit-to-qatar-and-uae-brought-in-rm4-1-billion-of-investments-via-agreements/>,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1 日。

③ “PM Ismail Sabri Meets UAE President,” *Malaymail*, September 27, 2022,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2/09/27/pm-ismail-sabri-meets-uae-president/30271#google\\_vignette](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2/09/27/pm-ismail-sabri-meets-uae-president/30271#google_vignette),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1 日。

④ “PM Making 4-day Official Visit to Turkiye,” *Freemalaysiatoday*, July 4, 2022, <https://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22/07/04/pm-making-4-day-official-visit-to-turkiye/>,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1 日。

暴行。例如在2022年4月16日,伊斯迈尔强烈谴责以色列在斋月期间袭击巴勒斯坦阿克萨清真寺内穆斯林的暴行,他强调以色列军队实施的隔离政策违反人道及侮辱巴勒斯坦人的尊严,马来西亚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以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和平与正义以及中东地区的繁荣<sup>①</sup>。但同时,他也积极尊重国内外其他不同宗教观念与文化背景的国家与民众,认为在多元化社会,相互尊重、理解不同文化非常重要,这也是造就马来西亚独一无二多样性的重要基石<sup>②</sup>。因此,伊斯迈尔中东政策本质上仍然是延续了慕尤丁时期的温和中东战略,即以经济实用主义与多元互动为具体策略组合,但是在具体实施效果与目标上,伊斯迈尔有效遏制了国内疫情的扩散与传播,推动国内经济在疫情后时代的迅速恢复与发展,重塑了马来西亚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形象。

### (三) 安瓦尔政府的中东战略(2022~2024年)

2022年11月19日,马来西亚全国第十五届大选结束,由于本次选举出现了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无一方过半的“悬峙议会”,希望联盟的安瓦尔最终成功当选新任马来西亚总理,开启了他全新的执政时代。安瓦尔的上台标志着马来西亚中东战略迈向了新的发展。

第一,实施强硬外交与多元互动。安瓦尔上台后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剧烈的变化之一即2023年10月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加沙地带45,028人死亡,近90%的加沙民众流离失所<sup>③</sup>。以色列此举立刻引发了整个伊斯兰国家的强烈抗议与不满,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安瓦尔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立场一致,强烈反对以色列的武装进攻,并要求立即停火。10月17日,安瓦尔与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进行通话,宣布马来西亚对人道主义救援的贡献,同时呼吁立即“停止轰炸并在拉法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并要求以色列“真正”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与巴勒斯坦,同时他

---

① 《马谴责以军袭清真寺 促国际寻策解决以巴冲突》,载《星洲日报》2022年4月16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20416/nation/3741656>。

② “Ismail Sabri Sets New Hallmarks in Malaysia’s Diplomacy, Say Analysts,” *The Star*, August 15, 2022,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22/08/15/ismail-sabri-sets-new-hallmarks-in-malaysia039s-diplomacy-say-analysts>,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1日。

③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已致超4.5万人死亡》,百家号,2024年12月16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8596153131505742&wfr=spider&for=pc>, 上网时间:2024年12月17日

也承诺提供 1 亿令吉的人道主义援助<sup>①</sup>。安瓦尔还坚持运用多元外交,持续夯实与拓展同中东多个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合作,例如重新开放马来西亚驻伊拉克大使馆。时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赞布里·阿卜杜勒·卡迪尔将此描述为马来西亚开始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积极主动国家的角色<sup>②</sup>。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伊朗的接触。这包括派马来西亚外长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这是马来西亚外交部长七年来首次访问伊朗。访问期间,两国承诺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随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和利雅得阿拉伯—伊斯兰联合峰会期间,他与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举行了两次双边会晤。

第二,“一边倒”与宗教外交的双重使用。这里的“一边倒”具有特殊的含义,并不与马来西亚长期坚持的不结盟和中立方针冲突,而是强调在巴以冲突特殊背景下的一种对外态度体现。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安瓦尔同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保持一致立场,即强烈谴责与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进攻,要求采取合适方式切实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安全。如当 2023 年安瓦尔结束对中东国家的访问后,在吉隆坡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上表示当下情况已达到“疯狂的程度”,是“野蛮的高度,”所以安瓦尔坚持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政策,外交上不承认以色列,也不承认以色列国家<sup>③</sup>。在笔者与马来西亚学者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d Ikbāl)博士<sup>④</sup>访谈中了解到,他认为当下安瓦尔也巧妙地运用宗教外交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与共识,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冲突是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与重大威胁,安瓦尔认为自身有着强烈的使命与责任,必须以伊斯兰教义为价值观念团结广大的中东国家以共同应对外来威胁,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安全。

第三,强调实用经济主义。在关注巴以冲突的同时,安瓦尔仍然重视马来西亚与中东国家的务实经济发展,特别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内主要区域大国,例如沙特与阿联酋。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东姑赛夫鲁阿兹上任后不久访

---

① “Firmly by Palestine’s Side: Behind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Israel-Gaza Crisis,” *Fulcrum*, October 27, 2023, <https://fulcrum.sg/firmly-by-palestines-side-behind-malaysias-response-to-the-israel-gaza-crisis/>,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

② “Malaysian Companies Embark on Iraq’s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Ties,” *NST*, August 26, 2023, <https://www.nst.com.my/news/nation/2023/08/947615/malaysian-companies-embark-iraqs-reconstruction-projects-strengthening>,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

③ “Malaysian PM to Raise Palestine Issue at Gulf-ASEAN Meeting,” *The Diplomat*, October 18,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0/malaysian-pm-to-raise-palestine-issue-at-gulf-asean-meeting/>,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

④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人文社会与科学学院高级讲师,现担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SPHEA),曾先后在马来亚大学(UM)取得本科与博士学位。

问阿联酋,就体现了这种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密切接触的战略。访问期间,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达成首个陆上非常规油田的勘探和评估协议<sup>①</sup>。首次访问阿联酋期间,安瓦尔总理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签署了一项协议,阿布扎比承诺在马来西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约80亿美元。随着马来西亚和阿联酋正式开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谈判,马来西亚将成为与阿联酋签署此类协议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的非石油双边贸易额超过20亿美元<sup>②</sup>。巩固马来西亚与沙特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被认为是安瓦尔中东政策的重要方面。安瓦尔在担任总理期间,选择沙特作为其在中东地区进行正式工作访问的首个目的地,并在任职第一年内三次访问沙特,足可见其对沙特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安瓦尔重塑中东战略是一种内外环境塑造下的结果。一方面国际环境的复杂化与恶化大大加剧了弱小国家参与地区事务管理的难度,伴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恶化,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巴勒斯坦,马来西亚需要充分考量到自身的定位与立场,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广泛参与到中东事务中,而平衡外交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另一方面,中东战略的具体实施仍然是受国内环境所决定的,即领导人认知变化与政治精英合法化路径。从安瓦尔本人来说,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人物,安瓦尔具有丰富的政治履历。在青年时代,他就创立了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组织(ABIM),而在1982年加入了长期执政的政党—巫统(UMNO)<sup>③</sup>。而他与马哈蒂尔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治国理念与思想也深受马哈蒂尔的影响,这也导致安瓦尔在中东策略上形成了一种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认知,有责任和义务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等普世价值的传播<sup>④</sup>,着力捍卫马来西亚等本土国家的思想观念,这也体现在他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巴以冲突中的批评<sup>⑤</sup>。而安瓦尔也深受伊斯兰因素的强烈影响,将中东伊斯兰国

<sup>①</sup> “ADNOC, Petronas Sign Abu Dhabi Unconventional Oil Resources Deal,” *Reuters*,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adnoc-petronas-sign-agreement-unconventional-oil-resources-abu-dhabi-wam-2022-12-05/>, 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

<sup>②</sup> “UAE and Malaysia Discus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The Sun*, September 29, 2023, <https://thesun.my/world/uae-and-malaysia-discuss-strengthening-economic-and-trade-ties-NA11551826>, 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

<sup>③</sup> “Anwar Ibrahim: The Man Who Fulfilled His Goal to Lead Malaysia,” *BBC*, November 24,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16440290>, 上网时间:2024年4月11日。

<sup>④</sup> 《“90后”的政治套路:马哈蒂尔与伊斯兰实用主义》。

<sup>⑤</sup> “In Berlin Visit, Malaysia Premier Criticises Western ‘Hypocrisy’ on Gaza,” *Middle East Monitor*, March 12,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0312-in-berlin-visit-malaysia-premier-criticises-western-hypocrisy-on-gaza/>,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0日。

家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的认知也影响了在具体中东战略的实施。因此,通过实施强有力的中东战略不仅可以增强安瓦尔新政府脆弱的执政基础,还可以充分赢得国内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充分信任与支持,进而提升新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促进国家的相对稳定。然而,马来西亚国内宗教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不断升级,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的崛起,搅动了马来西亚同穆斯林世界的互动。从笔者在马来西亚国内的实地调研了解到,伊斯兰党将现政府定性为“反伊斯兰政府”,并以此动员国内公众情绪,削弱安瓦尔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sup>①</sup>。所以,安瓦尔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也是为了增进现任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需要。此外,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政策框架依赖于外部投资,安瓦尔需要保证不让外国投资者担忧营商环境,同时也表示不会向加沙地带派军<sup>②</sup>。总体上,安瓦尔时期的中东战略并未超越前任的平衡外交政策,即以直接追随、有限制衡与经济实用主义等为主要方向,不同之处在于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是其战略的重点之一。

表 2 马来西亚不同政府中东战略的对比(2018~2024 年)

领导人	时间	具体战略	主要影响因素	实施效果
马哈蒂尔	2018~2020 年	经济实用主义、有限制衡与多元互动、强硬的伊斯兰形象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伊斯兰因素	中
慕尤丁	2020~2021 年	经济实用主义、多元互动、温和的伊斯兰形象	内部环境领导人认知 绩效合法化	弱
伊斯迈尔	2021~2022 年	经济实用主义、多元互动、温和的伊斯兰形象	内部环境领导人认知 绩效合法化	中
安瓦尔	2022~2024 年	直接追随、有限制衡、经济实用主义、宗教外交、强硬的伊斯兰形象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伊斯兰因素	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自 2018 年马来西亚政府更迭以来,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

<sup>①</sup> “Prove We’re Anti-Islam, Anwar Tells Critics of Unity Govt,” *Free Malaysia Today*, July 7, 2023, <https://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23/07/07/prove-were-anti-islam-anwar-tells-critics-of-unity-govt/>,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sup>②</sup> “Firmly by Palestine’s Side: Behind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Israel-Gaza Crisis,” *Fulcrum*, October 27, 2023, <https://fulcrum.sg/firmly-by-palestines-side-behind-malaysias-response-to-the-israel-gaza-crisis/>,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领导人会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与需要及时更新政策的组合与具体表现,但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仍然是一种平衡外交的有力体现,是实力较弱国家在面临不确定性的一种理性反映。从当下安瓦尔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实施来看,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对于促进与解决巴以冲突与加沙地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存挑战与危机,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重要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其中东战略将有助于加强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更多关注和支持,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支持与援助。此外,马来西亚安瓦尔政府的重要表态与发声对促进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团结与合作起到积极作用,为维护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安全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尽管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但并不是决定者,由于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导致巴以问题始终陷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困境,国际社会难以达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方案以根本性的解决。马来西亚因自身实力有限,安瓦尔政府虽然继续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并采取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袭击,但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维持与美国关系的相对稳定仍是马来西亚的头等需要,也不可能因巴以问题而全面恶化美马双边关系与合作。因此,马来西亚中东战略的调整与转变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考量,短期内安瓦尔仍然摆脱这一框架的制约。

#### 四、结论

中东地区一直是马来西亚外交战略的重点对象与目标,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中东地区在马来西亚外交规划的重要性便与日俱增,而随着马来西亚历任政府的先后更迭,其对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也出现相应调整。本文从理论层次和实际层次分析了马来西亚从2018至2024年中东战略的发展与调整,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历经马哈蒂尔、慕尤丁、伊斯迈尔与安瓦尔四任不同政府。尽管经历了领导人的先后更迭,但是作为东南亚国家与穆斯林世界的重要一员,马来西亚仍然延续着之前政府积极有力的中东战略,采取一种灵活巧妙的平衡外交以充分参与在中东地区的各项事务。在这四位领导人之中,他们的中东战略共同点都是保持对巴以冲突的相同看法,即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伤害与打击,谴责以色列的非人道主义行为,积极呼吁国际社会与联合国加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关注与保护。同时,都坚持将宗教外交与经济实用主义作为具体的战略手段,既要將伊斯兰教义作为联系与沟通中

东国家的具体纽带,进而强化同中东国家广泛的合作,又要注重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拓展,特别是促进马来西亚的对外经济发展。然而,战略差异表现在具体的实施效果与政策重心略有不同,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着力希望塑造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国家形象,而慕尤丁与伊斯迈尔则希望塑造一个温和的国家形象,由于新冠疫情与国内政治危机导致慕尤丁与伊斯迈尔将更多的主要精力放置于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政治稳定上,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关注略有分散。而马哈蒂尔与安瓦尔则保持了对中东地区更多的外交关注与投入,通过在中东地区积极活跃的事务参与接触,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进而赢得了来自中东国家的好感与亲近。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案例也表明,马来西亚的中东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平衡外交的体现,是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双重互动影响下所形成的。当中东地区局势不明与不确定性时,马来西亚会寻求以最小风险而参与到该地区事务中,以保证自己在该地区外交决策的充分活跃性。首先,从 2018 年到 2024 年,伴随着马来西亚国内领导人的先后更迭,马来西亚中东战略仍然不断发展与继续,而领导人的认知水平与国内政治精英合法化的不同路径影响着中东战略的具体表现与相对差异。其次,伊斯兰因素是影响马来西亚制定中东战略的核心要义与因素,无论国内领导集体如何更迭,伊斯兰因素都是维系马来西亚和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精神纽带与支柱。马来西亚也凭借着不同中东战略使用以充分塑造在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形象,以吸引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充分支持与信赖,进而促进本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和维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合作。最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具体行动变化和马美关系的发展也间接影响着马来西亚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与安排,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仍然将会积极参与到中东地区的各项事务之中,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李 意)